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Intellectual Inquiry

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知识与思想(下)

贺照田◆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Intellectual Inquiry

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 知识与思想(下)

贺照田 ◆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知识与思想(上下册) / 贺照田主编.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181-2

I. ①在…

II. ①贺…

III. ①哲学思想—思想评论—世界—文集

IV. ①B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240 号

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知识与思想(上、下)

主 编:贺照田

责任编辑:崔文辉 桑一平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36.25 字数:501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181-2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实录》（10 卷）、《北大哲学门》（10 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 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 卷）、《楚辞源流选集》（5 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 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 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 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 本）、《绿色经典文库》（16 本）、《大美译丛》（8 本）、《支点丛书》（10 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 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 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 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 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

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10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60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60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30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20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80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80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80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年9月28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目 录

陈启云：荀悦与后汉思潮·····	（高专诚 译） 001
龚 隼：禅门中的顿/渐新论 ·····	049
沟口雄三：论天理观的形成 ·····	（龚颖 译） 096
周昌龙：良知与经世 ·····	118
王汎森：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 ·····	151
黄进兴：李绂与清代前期的考据学转向 ·····	（江湄 译） 187
张寿安：清儒的考证经世与礼制重建 ·····	222
沈松桥：振大汉之天声 ·····	241
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史学反思 ·····	319
奚 密：诗的新向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	（唐晓渡 译） 377
王远义：独立苍茫 ·····	405
杨念群：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	438
沟口雄三：公私·····	（井口静 译） 508

振大汉之天声

——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

沈松桥

一、前言

近年来西方学界对国族（nation）^①与国族主义（nationalism）的大量研究，大抵都扬弃了纯粹“根基论”（primordialism）的立场，改而采取偏向“建构论”（constructionism）或“工具论”（instrumentalism）的观点。在这样的学术认知中，“国族”，一般而言，不再被视作由血统、语言、文化等根基性纽带（primordial ties）自然衍生的“既定资赋”（given）；反之，“国族”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发明”、被“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②Liah Greenfeld 便指出：世上并无“蛰伏不觉”（dormant）的国族等着我们找出其先天与俱的客观“国族特性”（nationality），以便将其自酣睡中唤醒；反之，人们乃是先被灌输一套虚构的国族认同，才会相信他们自己是一个统一的“国族”群体。^③换句话说，是国族主义意识形态催生了国族，而不是国族激发了国族主义的情怀。^④

不过，犹如 Renato Rosaldo 对建构论者的族群理论所作的批评，^⑤把“国族”当做是“想象”的产物，并不是问题的结束，反而是更多问题的开端。如果“国族”确实是一个“想象的社群”，我们不免要追问：是谁在想象？是通过怎样的文化、符号过程来进行想象？这样的想象又造成怎样的结果与影响？^⑥

这些复杂的问题，头绪纷繁，牵涉多端，迥非本文所能解决。虽然，

我们或许还是可以从一座人物塑像寻得一些思考的线索。

这座落成于1902年的雕像，矗立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市立公园。雕像本身朴实无华，不足称道，却是像主的身份发人深思。这座雕像纪念的，既非位高权重的王公巨卿，也不是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而是一位平凡卑微、名姓无传的书记。约当13世纪左右，这位书记撰写了举世第一部“匈牙利”历史——*Gesta Hungrorum*，将当时匈牙利地区人群发展的轨迹，追溯到西元5世纪匈奴英雄阿提拉（Attila，406—453）的军事征服，从而为19世纪的匈牙利国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与坚固的认同基础。^⑦

从这段轶事，我们可以窥见国族建构过程的一个特殊面相——一个文化“表达”（representation）的层面。这座书记雕像隐约指出：匈牙利这个“国族”所以存立的关键，与其说是“上帝之鞭”的征服行动，毋宁更是对此一历史事件的“叙事”（narration）与表述。就此而论，“国族”，乃是通过历史叙事的召唤，才可能被想象出来。Geoffrey Bennington 便说，“在国族的核心处，我们无疑可以找到一堆叙事；这些叙事包括国族起源的故事、建国先祖的神话，以及（国族）英雄的系谱。”^⑧

对于历史叙事与国族的密切关系，研究国族及国族主义的学者早有所见。1882年，Ernest Renan 在他那篇著名的演说〈何谓国族？〉中，便已明白指陈：“辉煌的历史、伟人、荣耀等等，乃是国族形成的社会资本。”^⑨ Anthony Smith 也指出：“为了创造一套足以令人信服的‘国族’表述，必定先要重新发现并夺占（appropriate）一个光荣而独特的‘过去’。”^⑩ 社会学者 David McCrone 甚至强调：“任何‘国族’都必须有历史，否则便无法成为‘想象的社群’。”他还引述了 Ernest Gellner 的警句：“没有历史的国族，乃是没有肚脐的国族。”^⑪

这些学者的论点也可以在世界各地实际发生的国族主义运动中，得到印证。19世纪下半叶，领导“少年拉脱维亚”（Young Latvia）从事民族独立运动的 Atis Kronvalds 便主张，为了促进爱国热情，“国族历史”乃是最足珍惜的知识形式。^⑫ 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那米比亚（Namibia）为了凝聚

国族意识，更透过各种策略，极力动员“历史叙事”与“历史表述”，将既有的族群过去重新界定为“国族的历史”，将部落的传统英雄改扮成国族的“解放斗士”。^⑬至于19世纪德国知识分子如赫德（Johann G. Herder, 1744—1803）、费希特（Johann G. Fichte, 1762—1814）等人之汲引历史书写以为推展国族统一运动之手段，尤为众所周知的具体史例。无怪乎 Anthony Smith 要将历史学者与语言学者并列为国族与国族主义的立法者与创造者；此亦所以 Eric Hobsbawm 要把历史家与国族主义者的关系比喻作巴基斯坦罂粟种植者与海洛因吸食者之间的关系。^⑭由是以观，20世纪初年，当晚清知识分子群起致力于近代中国国族建构时，竟亦同时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史界革命”，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奠定初步的基石，当然也不是无因而至的了。

然而，伴随国族与国族主义，俱生共荣的“历史”，绝非专业学院史家所应提供的“历史”。^⑮Renan 固然高度强调国族建构过程中历史的重要性，却也敏锐地观察到：遗忘历史，乃至扭曲历史，才是国族创立的枢纽；历史研究的学术进步往往只会对国族意识造成严重的威胁。^⑯

所以如此，盖与国族建构的内在逻辑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任何集体认同都是在社会过程中建构而成；然而，吊诡的是，集体认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却是竭力掩盖自身的建构本质。惟有在人为斧凿的痕迹消弭尽净之后，被建构而成的群体，才可能以“自然”的姿态展现，从而要求其成员不容置疑、无私无我的牺牲奉献。^⑰“国族”所以深撼人心，致令千万生灵全心相许、生死以之的魔力根源，也正在其透过一套特殊的历史叙事，完成了“自然化”的过程。用 Benedict Anderson 的话来说，“历史”为“国族”填补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鸿沟；借由一套经过独特安排的“历史”，国族才能将其自身投射于“渺远的过去”，并引向“无边无际的未来”，进而发挥俗世化的宗教性功能，把个人与群体生命中的“偶然”转化成为既定的宿命；也正因如此，国族才能激发国族成员最为深沉壮阔的热情。^⑱这样的“历史”，自然只能是一种“神话历史”（myth-history）^⑲或 Paul Ricoeur 所谓的“历史意识形态”（ideologies of history）^⑳。然而，这套

“神话历史”或“历史意识形态”，却对国族的符号性建构与群体凝聚力的创造，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决定性作用。^④如果我们借用 Walter Benjamin 睿智的寓言，把“国族”比喻作在棋赛中攻无不胜、战无不克的机器人，那么，“历史意识形态”便是那个躲在棋盘桌下的驼背侏儒。^⑤

在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晚清最后十年间大量涌现的“民族英雄”历史书写，明白窥见这种“神话历史”或“历史意识形态”的运作。

如上文所引 Geoffrey Bennington 那段话所示，在国族想象的伟大工程中，“民族英雄”无疑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黑格尔（Friedrich Hegel，1770—1831）把国族界定为由习俗、历史记忆与共同命运所构成的社群；国族历史中的英雄，便和该群体历代相传的神祇、天使、魔鬼与圣人等等，同样铭刻于国族成员的心灵深处；国族的公共庆典、运动竞技、宗教庙堂，乃至国族国家的内政机构与外交事务，几乎无处不见对这些人物英勇事迹的缅怀与颂赞。^⑥Anthony Smith 也指出：在族群团体迈向国族建构的蜕变过程中，为了强化群体的凝聚力量，一方面要提供群体成员自我认知的“地图”，另一方面更要从族群的历史记忆中发掘过往的英雄人物与光荣事迹，作为国族成员仿效师法的道德典范。这些“民族英雄”是否真有其人，其事迹是否确切可考，概与宏旨无涉，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被表述成国族精神的具体表征，必须化身为忠诚、高贵与自我牺牲的伟大楷模，以便激发后世子孙仰慕追法、为国族整体奋斗奉献的信念与决心。^⑦亚瑟王（King Arthur）之于英国、齐格菲（Siegfried）之于德国、威廉泰尔（William Tell）之于瑞士、阿格曼侬（Agamenon）之于现代希腊，便都是在国族主义文化逻辑的推动下，从湮没颓圯的坟冢堆中，被召唤出来，披上“民族英雄”的冠冕，成为各该国族认同膜拜的文化符号——即使他们自己未必了解“英国”、“德国”、“瑞士”与“希腊”究竟是什么意思。^⑧

晚清知识分子同样也是在国族主义的风潮鼓荡下，着手编造中国“民族英雄”的光荣系谱。为了“唤起国魂”、“振兴民族”，他们透过一套由特定的“框架、声音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⑨将上起秦汉、下迄

明清，前后二千年间的历史人物，扯出其原有的历史脉络，重加评鹭，编次甲乙，终至为近代中国的国族认同修建了一座华丽璀璨的殿堂——民族英雄的万神庙。

由是以观，以晚清为滥觞，而由后世踵事增华所成立的中国“民族英雄”系谱，或许和彼时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神话人物——黄帝一样，可以被当做是凝聚近代中国国族认同的重要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②；中国国族，当然也可说是由对这些“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与表述，所编造出来的一个“想象的社群”。

虽然，犹如黄帝符号曾在当时引发激烈的论争与辩驳，透过特定编码（encoding）方式，由“民族英雄”叙事所建构出来的中国“国族”，^③无论就其边界抑或本质而言，都不是一个固定而同质的整体。反之，在“历史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民族英雄”叙事，其所能促生的国族想象，无可避免地将是一个不断漂移、流动的无定之物，也将是一个充满质疑、抗争与妥协的权力场域。如 Anthony Cohen 所言，“历史”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它的具体形貌永远取决于不断的诠释与重构。^④任何基于特定视野与现实利益编造而成的历史表述与叙事，固然可以借由其所运用的诠释架构与论述策略，制造“真理效应”（effect of truth），^⑤乃至垄断“象征权力”（symbolic power），却仍将不断面临不同表述及叙事的挑战与抗争。晚清的“民族英雄系谱”，便是这样一个“历史政治”（politics of history）^⑥展演的舞台。在当时政治取向泾渭有别的知识分子群体间，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民族英雄系谱”；从这些不同的“民族英雄系谱”，我们更可以找到争持对立、抗辩不休的不同的中国“国族想象”。

二、“史界革命”与“民族英雄”的诞生

自 1887 年曾纪泽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以降，^⑦“睡狮”一语旋即不胫而走，喧腾众口，蔚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常用以况喻国家处境的意象。^⑧所以如此，不难索解。盖若中国不过暂时酣睡，本质上固仍不失

其强雄壮武，则寄望于中国未来之辉煌荣景，当然也就不是痴人说梦、河清难俟的了。

不过，“睡狮”之喻纵可有效纾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焦虑，却也不免引发一个更为棘手、更为迫切的难题：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这头兽中王者萎然长卧、衰靡不振，坐令封豕长蛇，纵横禹域，欧风美雨，沛然莫御？要透过怎样的努力，才能解除魔咒，使中国自漫漫长夜中瞿然警醒？

对于这些问题，梁启超率先提出一项具有典范意义的答案：民族主义。20 世纪的最初数年间，任公先后草成〈国家思想变迁同异论〉与《新民说》等文，从“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观点，盱衡世局，慨然指出：自 16 世纪以来，欧洲各国拜民族主义之赐，日益发达，驯至 19 世纪末期，更扩张而为民族帝国主义，遂挟全民族全体之能力，向外侵略，以与中国相竞争；乃中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以此而欲与“世界所以进步”之“公理”相抗衡，固若以卵击石，绝无幸理。因此，中国苟欲抵御列强欺凌，“以挽浩劫而拯生灵”，其唯从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一途可循。^④

然则，吾人又当循何途径，以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梁启超开出的药方之一，便是：历史。^⑤1902 年，任公在〈新史学〉一文中，开宗明义，便极力强调，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文明所以日益进步，泰半为历史之功；以故，中国如欲于世界竞争之大潮中屹立不摇，自不能不追法欧西，讲求历史之学：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⑥

梁启超之外，抱持类似观点者，亦正不乏人。1903 年，《浙江潮》的编者为文评介曾鲲化所著《中国历史上卷》，便说：“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

民爱国心之泉源。”^③《江苏》杂志上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在阐释中国民族精神时，也指出：一国之民族精神以历史与土地为根源，而历史之关系尤为紧要，“故言民族之精神，则以知民族之历史与其土地之关系为第一义，而后可以进而言生存竞争之理。”^④

但是，任公与同时期的知识分子虽对历史怀着如此热烈的期许，他们从传统历史叙事与文本所找到的中国的过去，却是一幅集黑暗、腐败与堕落之大成的黯淡景象。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痛陈中国数千年之历史“脓血充塞”，致使国民人格日趋卑下。^⑤1903年，《国民日报》发表“箴奴隶”一文，更直指中国民族乃“生而为奴隶者也”，所以如此，盖肇因于中国三千年之历史不过“独夫民贼普渡世人，超人奴隶之宝筏”耳。^⑥

既然中国的实际历史只是一部不断退化、充满耻辱的不光荣的纪录，那么，正如曾鲲化的感慨之语：“其尚得曰中国有历史乎？何配谈中国历史乎？”^⑦从黑格尔的历史定义而言，中国显然还不是一个“独立自觉”的“历史的民族”。这样一个“非历史的民族”，又如何可能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

在这里，梁启超等人显然陷入了近代亚非后进国家国族主义运动中屡见不鲜的一项困境。研究印度殖民地国族主义运动的 Partha Chatterjee 曾指出：西方近代国族主义是一套标榜普遍性意义的知识架构，并以超越各文化的畛域相号召。后进国家的国族主义者在接受这套知识架构时，同时也默认了伴之以俱至的西方“现代性”诸价值的普遍适用性；但是，国族主义的核心信念却又强调每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自我认同与独特性。因而，这些国族主义知识分子不能不既接受又反对这套来自异文化的知识与道德上的宰制，长期摆荡于“现代”与“本土传统”之间，徘徊踌躇，莫之能决。^⑧梁启超等人为了应付“生存竞争”的挑战，不能不接受国族主义及其所夹带的“现代性”价值，并据此否定中国的“过去”；但是，作为一个“国族主义者”，他们又不能不肯定中国历史传统自有其赖以存立的独特意义，不能须臾背离。^⑨

为了消弭这项紧张，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最常采取的策略，要不外乎致

力于自身历史文化的“再诠释”，借以重行“发现”或“振兴”足以契合“国族主义”之现代性价值，却又能够彰显国族独特性的“真正”传统。^④晚清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他们正是从“历史真实”与“历史表述”之间的落差，寻得了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换言之，在他们看来，中国历史所以积弊深重，并不是“历史”本身的错误，而是传统史家未能恪尽职守，有以致之。曾鲲化便曾回应上文所述的“睡狮”问题，大力抨击二千年来“独夫民贼、巨奸大盗”混浊国民脑筋、束缚国民手足，致使国人原有之蓬勃生机为之摧折；而“犯万世之不韪，为国民之公敌，祖毒民贼民者之门阀，而抹煞人间社会一切活泼文化之现状者，则历代史家实尸其咎。”^⑤《觉民》杂志作者重光也明白指斥传统史家所为历史书写如《二十二史》、《通鉴》等，不过“余一人之家谱”，于中国民族之性质，“阙焉无闻”；积习熏染，“国民之人格亡、爱情塞、道德堕落，而为优等人所压服”；追原祸始，“始作俑者，其罪真上通于天矣”。他甚至主张，为振救斯弊，“必取数千年蠹虫之历史彻底而燃烧之”。^⑥这些对传统历史书写的责难，用邓实的话来概括，便是：“中国无史矣！非无史，无史家也；非无史家，无史识也。”^⑦

正由于传统史家缺乏“史识”，他们对中国“过去”所作的叙事与表述，自是流弊丛滋，贻祸无穷。梁启超便认为二千年来传统史学卷帙虽繁，要皆不脱“四蔽二病”，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⑧而在这无数弊病之中，其影响最巨、罪愆尤重者，殆莫过于“历史主体”的隐晦沦胥：

法国名士波留氏尝著《俄国通志》。其言曰：俄罗斯无历史。非无历史也，盖其历史非国民自作之历史，乃受之自他者也；非自动者，而他动者也。其主动力所发，或发自外，或发自上，或自异国，或自本国；要之，皆由外部之支配，而非由内部之涨生，宛如镜光云影，空过于人民之头上……云云。今吾中国之前

史，正坐此患；吾当讲此史时，不胜惭愤者在于是；吾尝著此史时，无限困难者在于是。^{④9}

传统史家既未能正确掌握历史的“主体”，则其所为之历史表述与叙事，断非中国“过去”原有之真貌，而只能是历代统治者一家一姓的偏私纪录。1897年，梁启超首发其绪，即已指斥中国二千年来的历史文本，如正史、编年、载记、纪事本末诸流亚，“强半皆君史也”，“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⑤0}逮及20世纪初年，“君史”叙事传统更蔚为万矢齐注的抨击对象。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申引前义，再度指出：前代史家，“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致其所为史传，“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⑤1}他甚至抨击所谓《二十四史》者，不过“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耳；流毒所及，“吾中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是“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⑤2}

任公而外，晚清醉心改革的激进知识分子对中国史学传统提出类似批判者，比比皆是。1902年，马叙伦撰“史学总论”，强调史学著述当以“保国伸民”为宗旨，乃中国自秦汉以降，“史非民有，暴君酷吏，接迹后世，而史氏之称颂，洋溢行间，不问其贤与否也。史无公心，此污秽灭亡之史，不足观也。”^{⑤3}邓实则在《史学通论》一文中，慨然喟叹中国三千年来竟无一卷契合历史真精神之史著，“其所有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以是，中国旧史殆仅可谓为帝王之历史，“舍帝王以外，无日月；舍帝王以外，无风云。其所传威名彪炳之将帅，则攀附帝王者也；其所纪功烈懿铄之元勋，则奔走帝王者也；其所谓循吏传、儒林传、文苑传，则帝王下走之舆台也、帝王弭笔之文士也。”龙猪莫辨、棼如乱丝，而中国遂无史焉。^{⑤4}1903年，曾鲲化于其所著《中国历史》的序言中，更认为历代史家徒知“效死力于专制君主，以尽奴颜婢膝之本领”，“崇拜千百奇妖魔鬼，以奴隶神明贵胄之无量数美男儿；汇积累累串珠之墓志铭，而垄断